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张荣华
编

钱玄同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张荣华
编

钱玄同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钱玄同卷/张荣华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0-20641-7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钱玄同 (1887~1939) -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5925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钱玄同卷

张荣华 编

Qian Xuanto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印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22.75 插页 2	定 价	54.00 元
字 数	361 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钱玄同思想中的师承因素（代导言）

众所周知，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钱玄同在文学革命、汉字改革、疑古辨经等方面均有激烈的反传统的议论和主张，与乃师章太炎隐成敌国，在学术与思想上分道扬镳，虽说尚不至于如周作人那样有“谢本师”之举，实际也处于长年中断往来的状态，以至我们可以引用《庄子·山木》所言来形容这对师生关系：“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

但是远去的钱玄同身上始终存留着乃师的鲜明印记，即使是他批判传统的激烈态度和立场，也同样源自章太炎的启迪。钱氏自1908年听章太炎讲授小学和经史之学，并正式拜师，“自是直至十六年（按，即1916年）之春，专以保存国粹为志”。在学术和政治两方面都处于章氏思想笼罩之下。这一点在学界有关章门弟子的论著中皆有所讨论，而对两人晚年的交往则着墨不多。这里以20世纪30年代章氏北上讲学而师生重聚的史实梳理为契机，探究钱氏学术思想中的师承因素，并进而理解钱玄同晚年揭橥的“黎明运动”的理想也是渊源有自。

章太炎晚年因避战祸赴北平讲学，是影响民国学坛的盛举。黄侃、杨树达、黎锦熙、钱穆等时贤均对此作过评述，今人主要有卞孝萱《章炳麟的国学演讲》（见《现代国学大师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和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见《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两篇专题大作。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为还原历史的实相、抉发事件的意义作出了努力，惜均未注意参与其事的钱玄同的记述，因而或伤于简略，或存在明显失误。依据今存钱玄同日记稿本中记载的目击场景，可以充实章氏在京期间演讲和应酬活动的诸多细节，也能够透过章、钱交往情形感受其师生情谊的典型意义，进而

考见民国时期思想传承和学说授受的特征。

章太炎于1932年2月29日抵京，此时钱玄同与乃师已阔别十六年，事先并不知晓，当天“阅晚报，知太炎师今午来平，寓花园饭店”（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以下未注出处同此）。3月2日，他与同为章氏弟子的友人马裕藻（字幼渔）至饭店拜访老师，当天日记里作了如下描述：

别来十六年矣！近来态度如旧，益为和蔼，背颇驼，惟发剪极短，与当年披发大不相同。季刚亦在，检斋亦在。政客一大帮，与辛亥冬与[在]哈同花园时颇相像。询知师实避沪难而来也。四时许，朱、马、钱、黄、吴、师六人乘汽车逛中南海公园。六时雅于大陆春。

朱、马、黄、吴分别指朱希祖、马裕藻、黄侃、吴承仕，“雅”是钱玄同在日记和书信中表示吃饭的惯用语。在章太炎5月21日离京前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根据黄侃日记和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的有关记述，章门师生频繁聚餐，其中罕见钱玄同的身影。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据钱氏日记，除了3月21日至25日未写日记，这段时间内他在不同场合与章太炎同“雅”过十二次，分别在3月2日、3月12日、3月31日、4月4日、4月7日、4月8日、4月18日、4月20日、4月22日、5月12日、5月15日、5月16日。

3月12日是钱氏与黄侃在章师住处发生冲突导致决裂之日，研究者皆根据黄氏当天日记了解其中详情，“食罢，二风至。予屈意询其近年所获，甫启口言‘新文学’三字（意欲言新文学，且置不言），彼即面赤，警警争辩，且谓予不应称彼为二风，宜称姓字。予曰：‘二风之谑诚属非宜，以子平生专为人取浑名，聊示惩戒尔！常人宜称姓字，子之姓为钱耶？为疑古耶？又不便指斥也。’彼闻言，益咆哮。其实畏师之责，故示威于予，以塞师喙而已。狡哉二风！识彼卅年，知之不尽，予则浅矣。”（《黄侃日记》（排印本）下册，78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而钱氏也在当天日记里有记述，他认为争吵起因于在宾客满堂的情形下，“他称我为‘二疯’，问我近治音有何心得，我答以无。（我们的新方法、审音、实事求是而不立宗主，皆与季刚不合者，如何可以对他谈。）他忽然不耐烦地说：新文学、注音字母、白话文，屁话。我闻‘屁话’二字大怒，告之曰：这是天经地义，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必谈。喧哗了一场，殊可笑。移时溥泉（按，指张继）亦来，七时顷

去，季刚一怒而睡，睡醒即与张同走。至晚八时客始散，钱、马、马、吴四人，与师谈学甚乐，十一时始散。”两相对比，钱记侧重于学术观点的分歧，似应综合两造之言，才可以完整了解事情原委。各种论著皆言之凿凿地引述章太炎当时从中调解之语：“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啊，快要念あいうえお了啊。”但是两位当事人的日记均不见此说，似可存疑。

章太炎在京期间所作的演讲，综合各家概述共计八次，具体为：

3月22日，在民国学院演讲《代议制改良之说》。

3月24日，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

3月28日，在中国学院讲《治国学之根本知识》。

3月3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清代学术之系统》。

4月12日，在平民大学讲《今学者之弊》。

4月18日、20日、22日，在北京大学讲《广论语骈枝》。

然而实际演讲并不止八次。据钱氏日记，4月8日章氏在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弟子陪同下，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揭示学界救国之术》的演讲，内容分为四点：一、不可有好奇之见；二、不可专倚智慧；三、不可依赖群众；四、不可偏听偏信。这次演讲也未见各种章氏年谱著录，仅见于钱氏所记。

3月3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的演讲由钱玄同具体经办，他定下由该校文学院国文系、历史系与研究院历史科学门合请，讲题即《清代学术之系统》。演讲经柴德赓记录，经钱氏修订，两年后刊于《师大月刊》第十期。钱氏在“附记”中写道：“当柴君把这篇笔记誊清了，托方国瑜君交给我的时候，太炎先生尚未离平。我请他自己看看，他对我说‘你看了就行了’；而我当时竟偷懒没有看，直到现在才来动笔修改，实在荒唐得很。所以要是还有错误，那是我的不是，我应该负责声明的。”（《钱玄同文集》，第二卷，28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这篇六千余言的演讲对钱玄同的影响不小，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他不仅集中选购了一批有关清代学术的文献和时人论著，并在日记中留下多则长短不一的思考见解。1934年钱氏还在北平师范大学开设清代思想史研究的课程，按王学、史学、考证学、今文学四方面讲授，讲课内容中明显留下了章氏演讲稿的烙印。

4月份章氏在北京大学的三次演讲广受京城学界关注。钱穆对演说场景曾有绘声绘色的描述：“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

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太炎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17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张中行也在回忆文章中描绘过演说情景：“（太炎）满口浙江余杭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张中行：《负暄琐话》，“章太炎”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他们的叙述是今人了解此事的主要依据，然而八十老翁暮年追忆，难免有失真之处。好在有亲历其事的钱玄同提供的真实信息，使上述似是而非的记述得以纠正。据钱氏4月18日日记：“午后一时半至马家，移时半农乘汽车来，偕往迓师。盖（北大）中国文学系及研究所国学门请他讲《广论语骈枝》也。我翻译，建功写黑板。三时到，先看明清史料。四时讲，讲了一个多钟头毕。”4月20日日记：“二时许至幼渔家，与同乘汽车迓师。四时至五时许讲，仍未毕，星五当续讲一次。”4月22日日记：“（与马裕藻、刘半农）三人同往迓师，四时起讲，至六时毕。”日记清楚提供了三次演说的日期，可纠正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记时之误；也指明了演说是由钱玄同担任口译，其高足魏建功承担写黑板的任务。

令钱穆感叹钱玄同执弟子礼甚敬的情景却是事实。既睽违十六年，师生间情感依旧十分融洽。4月7日钱玄同做东宴请乃师，特地拉来俞樾的曾孙平伯介绍给章太炎，章称俞平伯为“世大兄”。次日章氏邀钱玄同、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等弟子在其住处午餐，钱氏当天日记载：“因即请老夫子写字，我请他写‘急就顾’三字，他说‘字则写矣，顾实未有也’，盖说我自己没有房子也。”钱氏自1913年起在北平做了二十多年教授，从未买过房，始终是租赁一族。4月22日北大演说完毕后，“师约我们同至其家吃南京来的大鱼，刘、马、钱、魏、朱、吴六人皆往。食毕，老夫子大拆其字，十时半始归”。

类似师生和睦相处的情景在钱氏日记里有多处记载。此时的钱玄同已经是名震海内的大学者，书法造诣也颇深，仍旧与二十多年前在日本时期一样，凡有章太炎的著作稿交给他，必定工工整整地为之誊录。《广论语骈枝》在演说前两天已交给他，“约七千字光景，午后三时起抄之，抄至夜半一时毕，手疲头胀之至。”（1932年4月16日日记）末句

并无抱怨之意，实因他正处在患病期间。在将此文交北大国学研究所刊印前，他还对全篇加了标点符号。据日记所载，4月27日“晚在孔德点《骈枝》毕”。28日“午后校勘标点之《论语骈枝》，恐引书出处有误，多检原书对之。晚撰高子篇高君附笺一则，寄炎师，拟附入也”。5月2日“得颉斋转来高子篇高君之附笺，师略改数字，云可用”。5月6日“上午九时至北大印刷所交稿，再为最后校对一次，即上板”。可知钱玄同并非单纯抄录，还在校勘等方面花费了很多精力。在这段时间内，他同时还在用篆书和隶书誊录章氏的晚年力作《新出三体石经考》一书，其间曲折在日记中也有记载。“将老夫子三体石经之解分片而书之，拟将王遗少（按，指王国维）所解释也抄上去。未写毕，精神疲倦。”（1932年4月23日日记）“午后回孔德，将老夫子之三体石经抄毕。”（1932年4月24日日记）“灯下将老夫子文中之字取三体石经原文摹下，因精神疲倦，弄得没有多少。”（1932年5月6日日记）此书在1933年刊印时，章太炎补写了一则跋语以志其劳，“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忽忽二十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稀，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稿本尚有数事未谙，夏复为余考核，就稿更正，故喜而识之。”（《章太炎全集》，第七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钱玄同对此书内容的商榷校订，及其对王国维相关研究见解的取舍，需另作专文考论。这里要探究的问题是，自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钱玄同在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等方面，虽然与章太炎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但并未见他作出像周作人那样的“谢本师”之举，也未曾作过“师如荒谬，不妨叛之”（鲁迅语）之类的表白，反而从上述情形可见其敬师之情愈趋淳挚。作为章门师生关系的一个典型，其中缘由很值得探究，借由发现维系章、钱师弟情谊的纽带，可以不囿于地域划分或宗派门户的视角，深入一层地理解民国时期两代学者之间复杂关系。在这方面，被研究者普遍认可的一种解释出自钱氏友人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黎氏认为钱玄同立说的基础在于他从章师处接受的经史关系论，“一般人以为他于章氏的‘古文’经义竟无所承，殊不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胆说话，能奏摧枯拉朽之功，其基本观念就在‘六经皆史’这一点上。”今人进而推论，“钱玄同反对孔教，主张六经皆史料，与章氏的精神一脉相承”（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见

《明清民国学人与学术》)。

此观点容可再作商榷，就影响上泛论，未必能切中肯綮。且不说“六经皆史料”是胡适、顾颉刚等人的主张，章太炎本人并不赞同，钱玄同对“六经皆史”说是明白地持否定立场。钱氏认为：

章实斋决非“六经皆史料”，但他也是托古改制。(1922年12月11日日记)

适之据章氏报孙渊如书中数语，谓“六经皆史”是说“六经皆史料”。此说我不以为然，不但有增字解释之失，实在和《文史通义》全书都不相合。(1930年4月6日日记)

这是他对胡适等人“六经皆史料”说的否定。

宋以前对于六经，除最无思想之博士和经师外，凡有思想之学者并不认为一物。……自宋以后便不然了，经师、学究且不论，以章实斋、龚定庵、康有为、夏穗卿、章太炎之高明，犹认为一物。或认为历史，则六经皆史；或认为哲理，则六经皆哲理矣。这实在可笑极了。(1925年2月16日日记)

这是他对乃师主张的“六经皆史”说的批判。

在钱玄同看来，六经只是性质不同的几部书，“六经”一名根本不能成立，“说六经是什么东西都是胡说”。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钱玄同对于“六经皆史”说皆作如是论。有鉴于此，从接受“六经皆史”论上强调章、钱精神相承是说不通的。至于那种着眼于功利论上的解释，说是趋新弟子需要先生光环笼罩以保住学术地位，学术已入守成的章氏也需要弟子的拱卫，从而形成师徒之间的向心力。这似乎是以时下学术界风气理解历史人物，想当然而并不实然。

从章太炎与钱玄同二十余年中多次探讨“修明礼教与放弃礼法”的问题而言，窃以为维系其师生情谊的纽带在于相同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钱氏受业于章太炎的次年，即1909年，师生二人已在东瀛之地初涉此问题，钱氏在该年6月12日日记中写道：

今日与师讲修明礼教与放弃礼法之问题。

这一命题在其日记里又表述为“修明私德与放弃礼法”。所谓“礼教”虽是魏晋时人斤斤辩解的题目，但语境更迁，在这里是用来表示个人道德修养。“礼法”也非泛称礼仪法度，北宋张载的短文《西铭》，经

程颐、朱熹的大力表彰而被奉为“入道之门”，集中体现了理学关于“事亲事天、修心养性”的道德论和人生观，而“礼法”正是《西铭》的核心概念。当时钱玄同读了明末归庄斥责金圣叹之文《诛邪鬼》后，觉得“深中下怀”，表示：“余以为明末修明礼教者顾炎武、颜元，放弃礼法者傅山、归庄，盖非李贽、金喟之徒所能望其肩背矣。”（1909年6月28日日记）他的见解明显受到章太炎的影响。1906年10月章氏发表在《民报》上的《革命之道德》一文，已凸显出顾炎武在培植个人道德方面的示范意义。《馗书》重订本新增《颜学》一篇，抬举颜元为荀子以后仅见之“大儒”，此文经修订之后改题《正颜》，收入《检论》。（钱玄同谓1909年时章氏已在修改《馗书》重订本，并拟“更名《检论》”。）《正颜》中虽删去“大儒”之说，仍强调颜氏学行非纪昀、翁方纲缺乏私德之流所能望其项背。他在致钱玄同信里阐发放弃礼法的思想依据时，又举出颜元作为例证，“横渠礼法之谈虽近周汉，乃其《西铭》所说，则与景教同流，视他人之出入释老者，又愈卑下，固不如颜子质实也。”（1910年10月20日函，见《鲁迅研究资料》第十八辑）章氏此见至晚年亦未改变，1932年演讲中仍旧称颂“清初有气节者，颜氏一人而已”。

钱玄同因“章先生称为郇卿以降之大儒”，对颜元、李塨、王源以及写《颜氏学记》的戴望也是礼赞有加，还函请远在上海的邓实代觅颜、李遗书。他根据学问、操行、辞章三者作为衡文标准，将古人文章划分为四等，学、行、文兼备为上等，其余依次为有学有行而无文、有文而无学无行、无学无行而无文，而顾炎武、颜元赫然在列上等之选。（参见1910年1月23日日记）

1912年师徒二人在国内相聚商讨此问题，章氏告诫弟子：

丁乱世，则放弃礼法未可非也。惟修明礼教者当如颜、李，不可饰伪；放弃礼法当嵇、阮，不可嫖妓。

嵇、阮是指魏晋贤士嵇康、阮籍。钱玄同闻教后当即表白：“丁兹乱世，余固以服膺颜、李学说昌明礼教，举止辄如嵇、阮也。”（1912年11月10日日记）时隔数周后，钱氏与同门康心孚、黄侃、汪东聚餐，对黄、汪二人席间言谈颇感失望，又念及章师训诫之语，遂在日记里大发感慨：

黄、汪固好学之徒，而今日席中言不及义，所言不出戏剧，询之则以欲图糊口、不暇为学为辞。唉！热中者日竞逐于议员、官吏

之场，其名为自好者，又皆以醇酒妇人消损其精神。民国真无人矣，至此始知章师之言真是确论。章师固言修明私德与放弃礼法者皆是也，然修明礼教必如颜、李，否则流于虚伪；放弃礼法必如嵇、阮，否则流于放僻邪侈矣。夫以嗣宗（按，指阮籍）之狂、容甫（按，指汪中）之醉，曾有荒淫女色优伶流连不反之事乎？余也抱作颜、李之心而行同嵇、阮，固有为为之，自问礼法曾放弃，而未尝敢得罪名教也。（1912年12月20日日记）

有关钱玄同的传记作品或研究论著，皆惯称钱氏是反礼教的新文化英雄，这其实是很大的误解，钱氏的思想特征在于反孔教而不反礼教。他所理解的“礼教”，密切维系着个人道德修养，就如同章太炎别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云云。”（章太炎：《革命之道德》）钱玄同对宋代理学家的评价，也显露出与章氏相同的着眼点：宋儒解经多不通训诂，喜以后世之见臆度古人，言心言性之处尤多纠缠不清，“惟注重私德，重贞节，尚廉耻，昌夏夷大防之伟论，此实百世所当景仰者。故后世汉学诸儒骂宋儒，予实以为当然。惟如纪昀、袁枚无行小人，断决礼防便兽行，此等人骂宋儒，实可谓泉壤之尤也。”（1912年11月21日日记）钱玄同不仅以此标准衡论他人，也同样据以律己。他平素生活态度唯谨，绳墨自严，虽然承受的是包办式婚姻，却拒不纳妾，不作狭斜游，也没有交女朋友的浪漫之举，仅有的一次“黄昏插曲”曾使他心烦意乱，“忽得一奇怪情书，可谓出人意表之外者，头胀心乱。”（1931年12月10日日记）这在其时操新文学行当的“名士”看来显得迂腐，而后者也属于钱玄同刻意回避不打交道之人。友人沈士远邀他吃饭，除了沈氏三兄弟、鲁迅兄弟及马裕藻等相识，“生客则有郁达夫一人，这位郁老先生虽则研究新文学的人，可是名士皮气太大，简直和黄季刚差不多，我有些怕领教，只好‘道谢了’。”（1923年2月23日日记）

论者都强调钱玄同具有出语惊人、思想偏激的特征，但更应当看到钱氏自有其不肯逾越之界域。他的偏激性格，通常表现于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政要显达之时，对待师友同门则始终能笃厚唯谨，恪遵师训。章太炎极厌恶学者中间所存在的丑态：“饰伪自尊，视学术之不己若者与资望之在其下者，如遇奴隶；高己者则生忌克；同己者则相标榜；利害之不相容者，则虽同己者而亦嫉之。”对师友弟子决不出奚落责骂之词。北上讲学时黄侃来拜见，章氏特地对他谈及黄宗羲“性多忌刻，于